

哈马斯在加沙对叛徒的处决

加沙最近的事件——哈马斯对合作者的处决——再次在全球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些行动之后，一种熟悉的模式浮现出来：与哈斯拉叙事保持一致的评论员迅速谴责巴勒斯坦人为“野蛮人”，并将道德愤怒指向巴勒斯坦支持者，因为他们没有以同样的热情谴责这些处决。这些指控并不新鲜——它们是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剥夺巴勒斯坦抵抗的合法性，并转移人们对加沙及更广泛巴勒斯坦人口所遭受的不成比例暴力和系统性压迫的关注。

背叛的简要历史

历史上每场战争中，国家都试图招募合作者——那些愿意为了金钱、权力或生存而背叛自己一方的个人。从二战期间的法国抵抗运动和纳粹告密者，到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再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逻辑始终如一：情报是强大的武器，背叛是其代价。加沙也不例外。然而，在这一背景下，对所谓“叛徒”的反应通过一种特别有毒且虚伪的视角被过滤。

叛徒的显著选择

在无休止的公开信息中，关于“带回人质”和“不让加沙挨饿”，人们可能期望以色列优先寻找能够帮助释放人质的盟友。然而，现实指向了一个不同的议程。以色列支持了一个名为“人民力量”的犯罪团伙，由亚瑟·阿布·沙巴布领导。这个团伙负责抢劫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并在加沙黑市上以高价转售食品。加沙内外许多人都知道，亚瑟·阿布·沙巴布被自己的贝都因部落驱逐和抛弃，部落宣布他和他的团伙为法外之徒。

这揭示了哈斯拉叙事的核心矛盾——声称关心人质并否认使用饥饿作为武器，同时支持犯罪合作者，他们的主要“成就”是从自己人民手中偷窃食物。

背叛与惩罚

无论意识形态或地理位置如何，每个国家都将背叛视为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在战时，背叛自己的人民可能带来致命后果——不仅对军队和政府，而且对依赖社会脆弱凝聚力的平民。因此，几乎每个国家的刑法和军事法都为叛徒规定了最严厉的惩罚，通常包括终身监禁或死刑。历史充满了例证。从二战后欧洲对纳粹合作者的处理，到冷战期间对间谍的处决，各国政府始终以严厉的惩罚捍卫忠诚的神圣性。

即使在已远离死刑的国家，背叛在罪行等级中仍占据特殊地位——往往仍是最后几种仍可判处死刑的罪行之一。在美国，联邦法律仍允许因叛国罪执行死刑。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叛国及相关罪行如“对国家发动战争”仍可判处死刑。中国、朝鲜、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定期对政治或间谍相关指控实施死刑。即使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叛国在法律上也可能导致死刑。全球许多政府仍坚称，背叛祖国是一项严重到足以正当化终极惩罚的罪行。

然而，当巴勒斯坦人惩罚合作者——那些被指控阻止人道主义援助到达饥饿人口的个体——时，他们不是被描绘为自卫的人民，而是被描绘为出于野蛮行事的无法无天的暴民。那些在自己国家支持或接受对叛徒严厉惩罚的观察者，当巴勒斯坦人为保护自己而采取行动时，却表达了**道德愤怒**。

军事法与虚伪

一些哈巴拉宣传者现在声称，加沙的所谓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审判。这是一个方便的讨论点，尤其是对于那些急于将巴勒斯坦人描绘为因在战争中应对背叛而野蛮的人。但这故意无视当地的现实：**加沙已不再有功能性的司法系统**。在以色列的破坏行动之后，**没有法院、没有监狱牢房，很可能也没有幸存的法官或检察官**。整个社区被夷为平地。政府部门、警察局、法院——一切都消失了。通常处理刑事调查和法律程序的机构已被炸成灰烬。在这种条件下，要求法庭审判不仅是不可行的——而且是不诚实的。

这正是**军事法存在的原因**：它是一个为民事基础设施不再运转时设计的法律框架。军事法不是漏洞——它是在社会崩溃时的最后手段系统。即使军事法在正确应用时，**也包含公平程序的规定**，尽管是以简化的军事形式。可能不像电视上播放的西装革履的律师庭审，但仍旨在遵循基本的正义规则——尤其是在时间、安全和社区生存都处于危险中的时候。

现在，将这与以色列系统的**公然虚伪**进行比较。以色列几十年来**对巴勒斯坦人常规使用军事法**，不是因为缺乏运作的法院，而是因为军事法**赋予国家更多权力和更少限制**。儿童被拖进军事法庭。被拘留者被关押数月而无审判。没有公开证据就下达定罪。以色列使用军事法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关于统治和控制。

因此，当批评者突然对加沙的“公平程序”表现出热情时，问问自己：当以色列对西岸的平民实施军事法时，这种关切在哪里？当以色列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拆毁巴勒斯坦人的房屋时，它在哪里？当行政拘留被用来无限期监禁没有指控的人时？当儿童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被审讯时？

这不是关于正义。这是关于**表演性愤怒**——使用法律和人权的语言，不是为了保护弱者，而是为了诽谤那些已经被围困的人。

故意抛弃

那些选择**与敌人合作**的人通常在战争结束时要求**保护或撤离**。这是间谍活动的潜规则：背叛者必须被收买——不仅是用金钱，还有救援的承诺。在敌对领土上冒生命危险的代理人很少出于忠诚；他们出于恐惧、绝望或机会主义而行动。他们几乎总是期望他们的负责人会在战斗停止时确保他们的安全。

在加沙，亚瑟·阿布·沙巴布及其“人民力量”团伙是否曾从以色列获得这样的保证尚不清楚。然而，越来越可能的是，**以色列没有兑现承诺**——或者根本没有真正的安排。现场报告显示，当停火生效时，这些合作者**被暴露无遗**，没有撤离或保护，面对他们所剥削的社会的愤怒。

这不会是第一次强大的国家在他们的用处耗尽后**抛弃其本地代理人**。同样的模式在阿富汗、伊拉克和越南反复出现，那里的口译员、告密者和为外国军队服务的民兵随后**被遗弃**，常常被自己的

社区视为叛徒而被追捕。对于占领者来说，这些人不过是方便的工具——在战役期间有价值，当目标改变时则可抛弃。

一次性资产，有用的死亡

如果以色列愿意，它可以安排撤离或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的死亡比活着时更有价值**。他们的处决变得有用——不是军事上，而是**叙事上**。通过让合作者落入哈马斯或当地民兵手中，以色列确保这些人将面临迅速、公开的惩罚，然后可以**作为巴勒斯坦残暴的证据广播**。哈斯巴拉代理人 and 媒体抓住了机会：分享了图形图像和视频，制造了道德愤怒，并大声提出问题——“为什么巴勒斯坦支持者不谴责这个？”。这不仅仅是遗弃。这是**宣传牺牲**。

这一策略遵循熟悉的逻辑：将巴勒斯坦人描绘成非理性的、暴力的，并且本质上无法维护公正审判或人权等“文明”价值。这使以色列能够摆出更道德一方的姿态——即便它从事集体惩罚、饥饿围困和加沙基础设施的系统性破坏。在这一叙事中，合作者不是一个人。他是**道具、棋子**，最终是**媒体战争的烈士**，在其中敌人的残暴必须始终被充分展示。他的生命是可抛弃的。他的死亡是政治资本。使这一策略特别有效的是它颠倒了受害者和恶棍的角色。不是因为创造背叛、内部混乱和绝望的条件而被追究责任，以色列可以将背叛的不可避免后果指向巴勒斯坦社会不可救赎的证据。

公开的心理战

这不仅仅是猜测。政府长期以来通过控制性泄露、选择性遗弃和叙事利用来操纵公众认知，使用**心理战 (psyops)**。从中央情报局到摩萨德，情报机构明白，战争不再仅在地面上进行——它在**思想中、屏幕上和通过头条新闻进行**。

让合作者死亡——并确保他们的死亡是可见的——服务于多个目的：

- **恐吓**：向加沙其他考虑合作的人传递信息——你们是孤立的。
- **去合法化**：使以色列能够将巴勒斯坦抵抗描绘为残忍和无法无天的。
- **分散注意力**：通过制造巴勒斯坦人必须为自己辩护的争议，转移对以色列战争罪行的关注。
- **分裂**：在巴勒斯坦社会中播下不信任的种子，助长无人安全的信念，即使在他们自己人之间也是如此。

西方媒体的选择性愤怒

如果你关注国际主流媒体对加沙战争的报道，你可能会认为最紧迫的人权问题是少数所谓合作者的处决。这些案件——以戏剧性的镜头、经过重度编辑的头条和严厉的道德化播出——主导了西方新闻网络的片段，充斥了社交媒体，并引发了关于所谓“巴勒斯坦社会野蛮”的无休止争论。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死亡**——仅在过去两年内，**以色列军队杀害了超过67,600人**——以一种官僚式冷漠被报道。如果有提到，也只是作为埋在关于以色列人质、军事行动或“哈马斯基础设施”头条下的统计数据出现。

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编辑疏忽——这是**叙事工程**。

为什么6、10甚至20个合作者的处决比数十万平民死亡产生更多头条？答案在于国际媒体如何被调教为**将以色列的苦难人性化并将巴勒斯坦抵抗定罪**，而巴勒斯坦的死亡被描绘为可疑的、偶然的或不幸的“不可避免”。以色列导弹袭击导致的巴勒斯坦人死亡被报道得像天气事件——悲惨，但非个人化。然而，巴勒斯坦人对合作者的处决却是**道德剧场**：为新闻主播、专家和政治家提供机会，质疑整个民族的人性。

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数十年来**去人性化**、种族主义以及西方媒体与以色列叙事的意识形态、财务和政治对齐的结果。报道的不平衡不是关于什么是新闻价值的；而是关于什么服务于主导权力结构。

异常的耸人听闻，常态的抹杀

处决令人不安，值得审查。但在加沙，它们是**例外**，而不是规则。以色列的空袭却是**常规**，即使摧毁整个社区，也常被描述为“精准打击”。这些袭击杀害了数千名儿童，夷平了医院，并使人口饥饿到大规模流离失所。然而，**工业化、国家批准的杀戮的残暴**不知为何比一个疑似叛徒在战火蹂躏的街道上的游行获得的感情报道更少。

为什么？因为合作者的叙事服务于一个目的：它确认了西方根深蒂固的偏见。它讲述了一个安慰性的故事，**巴勒斯坦人是问题**，即使在他们自己的苦难中也是如此。在这里，哈马斯——进而是所有巴勒斯坦人——是非理性的、报复性的，不配得到其他地方受害者获得的同理心。

这不是新闻——这是**意识形态维护**。

结语

在过去两年中，故事一直通过**占领者的视角**讲述，而不是被占领者。

我们目睹了合作者——外部力量的工具——被推上舞台中央，而埋在集体坟墓中的儿童变得无形。我们听到“文明”这个词不是作为行为的标杆，而是作为种族和政治优越感的徽章。我们看到对正义的呼声被扭曲为宣传工具——不是为了保护弱者，而是为了深化他们的去人性化。

哈巴拉叙事依赖于这种颠倒。它在混乱中蓬勃发展——在被殖民者必须始终证明他们的痛苦、愤怒甚至存在的信念中。当合作者被处决时，那是野蛮；当加沙被轰炸时，那是安全。当巴勒斯坦人抵抗时，那是恐怖主义；当他们无声地死去时，那是和平。谴责无能者的生存而原谅强者的杀戮的道德秩序根本不是道德秩序——它是由帝国书写的剧本，由媒体上演，并被那些对废墟中的倒影过于麻木而无法看到的人消费。

合作者的处决是崩溃的症状——一个法律和秩序被轰炸成灰烬的世界。

它们不是巴勒斯坦野蛮的证据，而是**强加于巴勒斯坦的野蛮**的证据。

参考文献

- 美联社。“哈马斯在加沙处决了二十多名疑似合作者。” 美联社新闻，2025年10月14日。

- **世界报.** “以色列对加沙武装‘人民力量’的秘密支持适得其反。” **世界报国际版**, 2025年10月10日。
- **路透社.** “加沙部落因抢劫和合作指控否认亚瑟·阿布·沙巴布。” **路透社**, 2025年10月11日。
- **《The Week》(英国).** “‘人民力量’是谁？以色列在加沙的代理崩溃内幕。” **The Week**, 2025年10月12日。
-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OCHA).** 人道影响报告第59号：加沙地带基础设施和治理损害评估。2025年10月3日。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OHCHR).** “加沙的民事机构和司法的破坏。” 新闻发布, 2025年9月25日。
- **美国法典第18标题 § 2381 – 叛国.** 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 有效至2024年。
- **B’ Tselem – 占领区人权以色列信息中心.** 军事拘留中的未成年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军事法庭, 2024年更新。
- **Addameer囚犯支持和人权协会.** 行政拘留统计和法律概览, 2025年5月。
-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关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以色列的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报告, A/HRC/59/73, 2025年6月。
- **美联社.** “加沙卫生部：死亡人数上升至67,600。” **美联社新闻**, 2025年10月14日。
- **《国土报》.** “以色列军方承认使用加沙当地民兵收集情报。” **《国土报》英文版**, 2025年10月9日。
- **国际危机组织.** 停火后：加沙的碎片化和报复, 报告第248号, 2025年10月。
- **半岛电视台英语.** “哈马斯称在处决前警告了合作者；以色列谴责杀戮。” **半岛电视台**, 2025年10月15日。
- **人权观察.** 以色列/巴勒斯坦：结束加沙的集体惩罚。2025年10月1日。
- **无国界记者.** 媒体叙事与战争报道：加沙2025, 2025年10月。